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何失败？

施莹莹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进行改革，但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在1991年却迎来自解体的结局，作为改革主导者的戈尔巴乔夫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将从梳理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破产过程，并从改革三层次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之处，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经验借鉴与警示。

【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15-00061-06

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的研究重点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苏联解体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但由于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不同，所得出的观点各异。截止目前，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可以找到十几种因素解释。其中，戈尔巴乔夫改革无疑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导火索。同时代中国的邓小平改革也经常用来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进行对比分析，同样是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却在1991年最后走向解体。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不仅可以不断警示着我们在全面推进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处理的关系与敏感点，同时也是给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

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破产

1、转变：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1985年3月—1987年)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上任后的戈尔巴乔夫主张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同时提出要对苏联原有体制做出改革和完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步伐。4月的苏共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自己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的初步构想：一方面是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按照列宁的理解，连续性意味着不断前进、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我们应当无条件地继承这一列宁主义传统，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政策和我们的总路线，以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为了排除阻碍发展的东西，要着重在经济上取得质量上的进步，全面提高经济集约化发展与生产效率，加快科技进步，由此“激活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整

个体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自治权利”。通过这一改革，戈尔巴乔夫要使苏联达到“新的质态，而且是最广泛意义的新的质态”，但此时戈尔巴乔夫尚未明确提出“新质态”的具体内涵。

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通过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和《苏共纲领新修订本》，提出“只有通过彻底发展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所有领域的向前发展才有可能”。在这份新党纲中，“社会主义人民自治”被确立为苏联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口号。但此时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在经济方面，党的基本任务是“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使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解决办法，经济发展加速在于科技进步与经济体制改革两方面。戈尔巴乔夫在本次大会上也表示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明确“苏联共产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就是在所积累的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这一学说”。由此可见，苏共二十七大确立的改革路线依旧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目标，同时开始提出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口号。

经济改革方案的推行并未一帆风顺，改革工作比预想的蓝图更为困难，党内关于如何推进改革出现了不同声音。面对重重困难，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阻碍来源于臃肿的党政机关、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与干部群众思想落后，这些都是自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苏联体制所带来的阻碍。因此，戈尔巴乔夫将改革的目光转向了政治体制方面。

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系统分析了经济改革受阻的原因,认为苏联社会存在着一个妨碍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阻碍机制”,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停滞发展,导致干部与人民们的思想落后。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民主是改革的实质,“只有通过民主与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应把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要扩大公开性,“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从“政治民主化公开化”到将“民主化”和“公开性”当作是实现改革的手段,改革方向从经济领域彻底转向政治领域。至此,原有的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被超越阶级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所取代。

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1987年底—1988年初)

在1987年11月20日召开的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的历史功过进行了逐一评价,并且提出“把人道主义目的状况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的旗帜紧握在手,人是改革的中心”。在戈尔巴乔夫的认识里,民主从改革的手段上升为改革的主要内容,同时超越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综合了近年来自己一系列的报告与讲话。这本书通过回顾苏联70年来的发展历史,批评了自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体制和模式,探寻苏联社会“阻碍机制”所形成的原因及其导致的“社会异化”后果,以此说明苏联原先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性变革”。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这种“革命性变革”的思想根源在于对列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新发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及其基本原则的“恢复”,改革的动机是出于“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考量。从这个改革动机出发,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制度,而是要通过实现人道、民主、公正等道义原则来实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因此不能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些道义原则高于阶级利益。在这本书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人道

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且将人道民主公正等超越阶级的道义原则上升为苏联要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蓝图。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的报告,将《改革与新思维》中的思想观点进一步明朗化,民主化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决定性手段”,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良心、公正和自由,道德和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关于社会主义“新的质态”设想基本阐述成型,即必须在人道主义和民主化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思想观点尚未系统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尚未完全形成。

3、“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步形成(1988年—1990年初)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将收效甚微的经济改革完全归结为现有的政治体制阻碍,认为斯大林体制的专制性与集中性导致人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国家机构官僚化集权化,得出结论——苏联改革需要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通过大会提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三项“革命性倡议”——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民主化是政治改革的纲领性方针,公开性、多元化原则是支柱,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戈尔巴乔夫在本次大会上阐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并且从七个方面描绘了这一社会主义“新质态”的基本参数和主要特征。从这次大会开始,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从苏共二十大所说的“完善社会主义”转向“更新社会主义”,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一个最大限度的毫无保留的公开、以及在任何方面都完全民主的人道主义社会。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大力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并继续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论证。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构想。文章反复强调“人道的”与“民主的”两个概念,并提出社会主义的五条标准。在改革初期,大家认为纠正现存社会机制的部分歪曲现象即可获得成功,但是苏联所要面对的是过去几十年所形成且完全定型的制

度,因此戈尔巴乔夫提出务必要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改革,以“革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戈尔巴乔夫所提供的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便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在改革进程中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依靠的是高效率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一流成果,以及人道主义的社会结构,它本身能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现民主化,并为人们积极的创造性生活和活动创造条件”。戈尔巴乔夫的这篇文章是其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的新年讲话中宣布苏联改革的目的所在:“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1月13日,他进一步提出改革是“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服务于人为社会方向的社会主义过渡”,不再反对取消宪法关于共产党在全苏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开始认同多党制是符合社会需求的政治制度。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形成,戈尔巴乔夫开始着手将这一思想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政治模式和政策来加以实践。

4、“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破产(1990年2月—1991年8月)

1990年2月,苏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大会上主张修改苏联宪法,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准备实行多党制,允许各种政党存在并开展活动;并要求“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把重点放在“包罗万象的民主”;同时还建议实行总统制,要求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苏共中央2月全会通过了要提交苏共二十八大审议的行动纲领草案,《真理报》以《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题进行了刊登。该草案提出苏共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要与“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决裂”,“放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观相抵触的简单化的阶级立场”,放弃政治垄断地位。党的主要目标是“使人处于社会发展中心,保证社会公正、政治自由以及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精神解放的可能性”,主张实行“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制和政治多元化”,实行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3月14日召开的全苏人代会通过《关于设立苏

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正式取消了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苏共中央全会之后,凭借着总书记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在苏共党内推行,接下来是通过苏共代表大会在全苏联进一步推动落实。

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苏共章程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政治方面,大会宣布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它“将在民主过程范围内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选举范围与争取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看,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苏共将“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中捍卫作为政治领导的权利”,这一声明放弃了苏共的执政党地位,苏共变由原来苏维埃社会的领导核心变成同其他政党组织平等竞争的关系,实行多党制。经济方面,大会认为“市场经济是排除过去的国民经济行政命令管理体制的唯一选择”,苏共主张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化等方式,建立多种所有制“平等”“自由竞争”、多种经济成分能并存的市场经济。思想方面,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声明苏共坚决放弃“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给思想以自由,解除对头脑的羁绊”,党的机关对意识形态要“放弃监督”的职能,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以这次大会为转折点,苏联社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通过权力机关在全党全社会得到落实,正式推行。

1991年,苏联社会陷入了经济全面停滞与政治局面失序的瘫痪失控局面中,经济上生产力与生产积极性严重下降,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政治上民族矛盾、游行示威、暴力活动接连不断。8月19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已走入死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控制。”呼吁“终止目前的混乱时期”,“恢复法制和秩序”,“尽快使国家和社会走出危机”。八一九事件的爆发宣告了苏联改革的全面失败,也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全面破产。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分析

对于苏联体制带来的弊端认识上，戈尔巴乔夫的认识是正确的——需要通过改革来革除苏联体制弊端，带领社会主义国家走出困境。但是，苏联最后却走向了解体，这又是为何？本文将价值理念、战略设计和组织行动三个层面来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1、改革的价值理念——领导人对思想价值主义的认识

改革的价值理念反映了改革者的价值性思考和政治性谋划，在社会主义国家初期改革中尤其与领导者对思想价值主义的认识相关，主要体现在改革领导者对改革性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上，这将关系到改革策略的制定与具体的执行。领导人对于改革性质的不同认识将关系到所领导的政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与否，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是一场对社会的彻底改造，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多元化发展，将影响苏共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坚持。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经济加速发展战略”遇到阻碍之后，开始转向认为自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体制是一种集权专制体制，如果要改造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那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需要进行一场完全性改革。在这种思想价值的主导下，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动机、手段、内容与最后目标都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讨论范畴，跨阶级地追求民主、公开、人道主义等道义原则。苏共十九大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主导下，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整个政党偏离了走社会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在主张社会主义多元化后，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精神垄断。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构建了社会主义“新质态”，在人道主义和民主化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社会主义。由此，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侵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主张公开性，让人们知晓一切。公开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认为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任何的空白，这使得苏联国内各种反动思想与历史虚无主义肆虐，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全国泛滥，党内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了意识形态混乱失序的状态中。领导人带头批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首先使得党内思想混乱，各种思潮趁机在党内外兴起。领导人倡导一切向民众公开，人民在各种思潮的冲击

下，无法正确地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与苏共，陷入恐慌与怀疑否定中，整个社会思想失序混乱。

2、改革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战略设计

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指导理论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实践活动效果的好与坏，指导理论成型之后的实践体现在领导人对改革战略方案的设计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揭示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由于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势必与行政管理体制紧密相连，经济体制改革会动到了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从而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单纯的经济改革并无法革除社会的积弊，需要与之匹配的政治改革措施，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才能确保国家改革稳步推进。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从经济改革直接转向政治改革，整个改革过程显得尤为激进与颠覆。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便开始推行“经济发展加速战略”，但在经济改革推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便认为经济改革是毫无成效的，并且将这一原因归结为社会中存在“阻碍机制”。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政治改革在整个改革中至关重要，为经济改革开拓了前进的道路，从而苏共对改革的关注转移到了政治改革上。1987年这一年，戈尔巴乔夫不断阐述个人主张，将民主与人道主义上升为改革的主要内容，坚称实现人道主义是改革的动机，并且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将自己的思想主张“兜售”给整个苏共。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开始大力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体制完全不兼容，需要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所谓“扭曲的变形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转变历时短暂且跨度极大，思想提出后立马通过中央全会与代表大会强行推广到全党全国，导致苏共的整个改革战略设计不断推翻重新设计。相比于经济基础的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更为

首要，只要实现了民主化与公开性原则，人道主义自然会实现，经济也自然会好起来。戈尔巴乔夫的战略使得苏联的改革方案逻辑简单，不考虑苏联与苏联人民的真实情况。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在于民主化和公开性。在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思考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而不断削弱党的领导。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做出政治民主化决议之后，苏共一步步让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到“所有党组织都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将苏共的地位下降到与其他党组织同一水平上。戈尔巴乔夫决定贯彻民主化的纲领，提出“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手里”，戈尔巴乔夫本意是试图通过人民选举和授权，将苏共垄断政权的合法性从暴力革命转变为选民认同，体现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民”的人道主义目的，但是当这个纲领实行之后，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政党制度也从一党制演变成了多党制。

由于自由选举的实行，1989年3月苏联实行人民代表选举之后，激进派、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对派分子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改变了过去苏维埃全是共产党员的格局。苏维埃作为苏联国家政权机关，政治成分遭到严重破坏，苏共作为苏联全国唯一的统一性的政治力量被各种政治势力所蚕食，苏共失去了对立法和高层决策的控制，从而也失去了对改革的政治领导权和组织实施权。1990年2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议修改1977年苏联宪法中第六条关于“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国家和公众组织的核心”的内容，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非常)代表大会直接将上述第六条删掉，宣布“苏共和其它政党、社会团体通过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并以其它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从此苏共彻底失去其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3、改革的组织行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的指导思想与战略设计完成之后，在推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处理好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改革的方向可能会被

左右甚至失败。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经济加速发展战略”过程中遇到阻碍，便将其问题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是对经济的垄断，因而决定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路子。1991年7月1日，苏联议会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开始实施私有化。但当时苏联人民一穷二白，生活困难，最终这些生产资料还是由少数富人所购买，资产阶级重新在苏联壮大。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市场经济，反而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状况空前恶化，群众生活艰难，社会矛盾尖锐。

改革的具体执行者是自上而下的党政机构干部们，各级干部对改革措施的执行关系到整个改革的存亡，没有好的执行者，再好的指导思想与战略设计也只是纸上谈兵。为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经济加速发展战略”，1985年4月23日到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前，戈尔巴乔夫更换了部长会议6名副主席，40多名党政中央部长，约50名共和国及州委第一书记，同时起用了一批年轻的干部担任关键性的领导职务。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领导层实行大换血。但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替换并未有正式的纲领性文件要求，更多地是为推行个人策略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戈尔巴乔夫可以如此迅速地按照自己的设想推动改革，更换干部人选，原因在于掌握苏联全面权力的苏共总书记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戈尔巴乔夫没有改变这一领导体制，反而是利用这一身份强迫苏共党内接受其改革策略。而当戈尔巴乔夫发现随着“民主化”的推行，苏共失去权力垄断地位之后自己也随之失去权威。总统制的提出便成为戈尔巴乔夫试图重建政治权威的重要举措，但失去领导地位的苏共再也赋予不了戈尔巴乔夫这个总书记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地位，戈尔巴乔夫个人毫无克里斯玛型统治者的权威魅力，即使赋予总统再多的权力，也挡不住戈尔巴乔夫的倒台。

三、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启示

戈尔巴乔夫正确地认识到苏联体制对整个苏联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想法，这一认识超越了前几任领导人对苏联体制修修补补的改革想法。但在经济改革受阻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偏离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性质这些基本价值的判断偏离，提出

了民主、公开、人道主义等道义原则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理念原则。在“民主化”与“公开性”的呼吁下，戈尔巴乔夫带头批判苏联体制与苏联历任领导人，彻底揭开了苏联社会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曝光了百孔千疮的苏联社会。这一系列举措直接导致党内外思想混乱，苏共党员对所信仰的马列主义产生动摇，党员立场摇摆。人民无法判断思想对错，但当人民认为自己的生活基本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便会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是制度的错误，跟苏维埃社会苏联制度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地位，整个社会陷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中。

价值理念判断出现误差导致战略设计上更为混乱，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的改革着眼于“民主化”，使得苏共失去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戈尔巴乔夫本意是试图通过人民选举和授权，将苏共垄断政权的合法性从暴力革命转变为选民认同，体现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民”的人道主义目的，但自由选举开展之后苏共的权威与认同并未能赢得所有选民的支持，反而使得反对势力大量进入苏维埃，从而导致苏共首先失去对立法和决策的控制。随着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方案通过之后，苏共彻底地失去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虽然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总统制来弥补挽回这一局面，但凭借其糟糕的个人能力也无法挽救整个失序的局面。

改革的价值理念、战略设计和组织行动三层次运用在每一场改革中都可以进行分析，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展改革，但是有些底线不容跨越，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的坚持，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经济上关注人民基本需求的满足。立足于不同国家不同的背景与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设计改革策略，稳步推进改革措施，以人为本，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参考文献

- [1]黄星清.从苏联解体看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危害性[J].红旗文稿,2015(11):32-36.
- [2]李永全.苏联改革历史回顾——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01):14-21.

- [3]汤德森,赵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的严重偏差及深刻教训[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1):85-93.
- [4]瓦·伊·茹科夫,粟瑞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3(11):72-84+96.
- [5]王立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思潮失控与苏联剧变[J].南京社会科学,2015(02):133-137+144.
- [6]王鹏,罗嗣炬.戈尔巴乔夫对改革受阻的体认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抉择[J].俄罗斯学刊,2017,7(02):79-86.
- [7]薛小荣,鄢沈青.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及其政治后果[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01):74-81.
- [8]薛小荣.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大国改革的“十大关系”——兼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J].探索与争鸣,2019(01):135-140+144.
- [9]薛小荣.执政党如何破除利益固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例[J].探索与争鸣,2016(11):131-134.
- [10]晏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失败原因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04):70-77.
- [11]叶书宗.现实主义才是成功之本——读薛小荣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新著的随想录[J].探索与争鸣,2019(01):117-124+144.
- [12]余伟民.改革如何寻求共识——简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的三种立场[J].探索与争鸣,2019(01):125-127+144.
- [13]张美.在邓式改革与戈式改革的比较中分析苏共的历史悲剧[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37(09):8-12.
- [14]周新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走上改旗易帜邪路的一个典型——评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4,16(05):15-21.
- [15]朱熙宁.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及其实践研究[D].南开大学,2014.
- [16]左凤荣.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主要原因的思考[J].探索与争鸣,2019(01):128-130+144.